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RELIGIOUS
CONFLICTS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张志刚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RELIGIOUS
CONFLICTS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张志刚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张志刚等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4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ISBN 978 - 7 - 5141 - 0458 - 5

I. ①当… II. ①张… III. ①宗教 - 问题 - 研究 - 世界
IV. ①B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3783 号

责任编辑：张庆杰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

张志刚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32.25 印张 610000 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0458 - 5 定价：8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經此勝事

謹此問安

賀教務部

新校向日

金玉三尺

手書
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

课题组主要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锁劳 田 炜 李四龙 吴 飞
吴冰冰 沙宗平 张训谋 赵匡为
贾建萍 徐凤林 唐孟生

编审委员会成员

主任	孔和平	罗志荣				
委员	郭兆旭	吕萍	唐俊南	安远		
	文远怀	张虹	谢锐	解丹		

总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强大动力。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双百”方针，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理论创新为主导，以方法创新为突破口，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立足创新、提高质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发展局面。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理论创新，服务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自2003年始，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计划。这是教育部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教育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重大攻关项目采取招投标的组织方式，按照“公平竞争，择优立项，严格管理，铸造精品”的要求进行，每年评审立项约40个项目，每个项目资助30万~80万元。项目研究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鼓励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的联合研究，鼓励吸收国内外专家共同参加课题组研究工作。几年来，重大攻关项目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以提升为党和政府咨询决策服务能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战略目标，集合高校优秀研究团队和顶尖人才，团结协作，联合攻关，产出了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壮大了科研人才队伍，有效提升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实力。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为此做出重要批示，指出重大攻关项目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影响广泛，成效显著；要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紧密服务国家需求，更好地优化资源，突出重点，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这个重要批示，既充分肯定了重大攻关项目取得的优异成绩，又对重大攻关项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殷切希望。

作为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秉持以管理创新

服务学术创新的理念，坚持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切实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对重大攻关项目的选题遴选、评审立项、组织开题、中期检查到最终成果鉴定的全过程管理，逐渐探索并形成一套成熟的、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管理办法，努力将重大攻关项目打造成学术精品工程。我们将项目最终成果汇编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文库”统一组织出版。经济科学出版社倾全社之力，精心组织编辑力量，努力铸造出版精品。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欣然题词：“经时济世 继往开来——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成果出版”；欧阳中石先生题写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书名，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是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深化的不竭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强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要求。我们要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新实践，适应新要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以改革创新精神，大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前　　言

这部专著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04JZD005）的最终成果。作为本项目的首席专家，我想借此着重说明两个问题：这个攻关项目有什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课题组是怎么探讨这个攻关项目的？

一、宗教冲突的严峻性

冷战过后，尤其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宗教冲突”不仅已成为国际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眼儿，而且还是国内外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可是，如果我们放眼于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全面而具体地予以研究的话，那便可以发现“直接的或单纯的宗教冲突”，即因信仰上的差异或矛盾而引发的宗教或教派之间的冲突，规模大多较小，影响范围也大多有限，尚未发展到左右全球局势的程度；而近些年来，国内外新闻界和理论界之所以十分关注所谓的“宗教冲突”，主要是因为，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几乎都有不可忽视的宗教因素或宗教背景。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为什么宗教因素或宗教背景会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呢？

早在“9·11”事件发生的前一年，当时兼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钱其琛副总理就指出，冷战后，宗教、民族问题突出起来了，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差不多都与宗教、民族问题分不开。冷战后的宗教问题有这样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1）宗教经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2）宗教自由经常与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3）宗教经常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4）宗教经常与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分裂或统一联系在一起；（5）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了国家和民族

的界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研究宗教问题。^①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促使国内外专家学者回首冷战前后国际局势的剧变过程，重新思考宗教背景或宗教因素对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广泛影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陆忠伟指出，波黑冲突、北爱尔兰问题、印尼马鲁克群岛与亚齐问题、克什米尔纷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无不包括愈益复杂、愈益增强的宗教因素。“因而，可以说，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宗教、民族问题是‘9·11’事件后驱动国际政治的一股重要动力，并引起了国际局势的痉挛性波动。”^②

以上分析判断表明，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不但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而且此种影响是以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并非直接或单独通过“宗教事件”或“宗教问题”反映出来的。因此，假如像亨廷顿那样用“文明冲突论”来通盘解释冷战后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并把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一并归结为“宗教冲突”，恐怕难免导致“貌似深刻的思路而实则武断的逻辑”。^③这就不能不令我们从方法论上反思：目前流行的“宗教冲突”概念及其理论是否过于简单化，即是否流于泛泛而论了？

“冲突问题”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研究领域所重视的课题。广为参考这些学科的丰富成果，特别是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理论”和国际政治学的“国际冲突理论”，无疑有助于克服泛泛而论“宗教冲突”的简单化倾向。^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① 参见钱其琛：《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点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此文为钱其琛在2000年5月26日举行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院5周年及国际政治系建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② 以上概述及引文，参见陆忠伟：《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序”，第1~2页。

^③ 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分析，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冲突原因’研究现状评析”。

^④ 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理论”，可参见〔美〕乔纳森·特纳，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版），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编“冲突理论”；〔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贾春增、董天民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讲“冲突理论（1）”，第9讲“冲突理论（2）”。关于国际政治学的“国际冲突理论”，可参见〔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5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蒲宁、陈晓东：《国际冲突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较之社会学和政治学，宗教学对于冲突问题的研究尚显薄弱，主要还是借鉴这两个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关于此种研究状况，可参见 *Critical Terms for Religious Studies* (Edited by Mark C. Taylor,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一书的“Conflict”一节。

要想切实地回应前述重大问题——为什么宗教因素或宗教背景会对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显然无法照搬照抄其他学科现有的“冲突概念及其理论”，而理应抓住这个重大现实问题中的“关键词”——“宗教因素及其影响”，力求在宗教学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宗教现象的复杂特性、社会作用或文化功能。

二、宗教对话的必要性

“宗教对话”是当今国际宗教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一个前沿领域。关于宗教对话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当代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多元论的倡导者希克（John Hick, 1922—）发人深省地指出：直到最近，世界上现存的任何一种宗教几乎都是在不了解其他宗教的情况下发展的。^①当然，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宗教扩张运动，使不同的宗教相遇。例如，公元前后佛教的扩张，7~8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19世纪基督教的扩张等。但在上述扩张运动中，不同的信仰者相遇的结果，大多是“冲突”而不是“对话”，这显然不能使各宗教相互认识或相互理解。只是这一百年来，就各个宗教所展开的学术研究，才为如实地理解“他人的信仰”提供了可能性。^②

美国天普大学天主教思想和宗教对话教授、“全球伦理”的发起人之一斯威德勒（Leonard Swidler, 1929—）也抱着同样的学术批判精神，描述了“近况”：直到最近，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中，尤其是在基督教那里，还很少有人想到，应该通过与其他宗教的对话来寻求智慧或真理。一个半世纪前，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还在痛斥所谓的“信仰无差异数论”（indifferentism）。直到1964年，也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公会议期间，罗马天主教会的观念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教皇保罗六世（Pope Paul VI）发表通谕强调：对话是时代的呼唤，是人类社会的多元化与成熟性的要求。^③

^① 希克是在《宗教哲学》里提出此观点的。该书现有1963、1973、1983、1990年版，在第4版里希克仍用“最近”一词。

^② See John H. Hick, *Philosophy of Religion*, fourth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90, pp. 108–109.

^③ 以上概述参见〔美〕斯威德勒著，刘利华译：《全球对话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概述是笔者参照英文原稿重新翻译并概括的，在此顺便感谢中译者赐予英文原稿。

斯威德勒的以上描述侧重于基督教的、特别是天主教的立场观点。相比之下，当代著名的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和宗教学家麦奎利（John Macquarrie, 1919 – ）的提法则显得更全面也更中肯一些。下面是1995年11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表讲演时的开场白，当时宗教对话研究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当代世界一个鼓舞人心的事实，是各大宗教传统之间正在对话，这对话不仅正变得更加普遍广泛，而且正变得更加严肃认真。在以往，这些宗教各走各的路，彼此甚少接触，即便有所接触，也是以辛酸和对立为特点的。然而，在我们这个通讯便捷和交通迅速的正在缩小的世界上，我们不得不日益靠拢之际，在各种宗教之间也就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得到相互的友谊和理解。事实上，这可以大大有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①

前述几位国际著名学者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基本角度强调了宗教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还是要数当代著名的天主教神哲学家、《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汉斯·昆（又译孔汉思，Hans Küng, 1928 – ）所做的概括最为简明扼要、振聋发聩。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位堪称“当代宗教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神哲学家便在多种重大场合不厌其烦地宣讲如下观点：

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之间的和平；
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
没有宗教研究，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②

^① [英] 麦奎利：《世界宗教之间的对话》（1995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的讲演），《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冬季号，总第12期，第1页。

^② 这几句话并非直接引文，而是综合了汉斯·昆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多种说法。据他本人回忆，1989年，他应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之间的和平”的说法（参见韩松：《孔汉思教授访谈录》，载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第4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此后，这种说法不但在他的多种论著和许多演讲里得以传播，而且不断予以补充完善。据麦奎利介绍，仅1995年前（即1989年至1995年间——作者注）汉斯·昆出版的好几本书里，一开头就都有这种说法（参见麦奎利：《世界宗教之间的对话》，《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冬季号，总第12期，第1页）。另据笔者所知，自1989年以来，汉斯·昆在许多重要场合的讲演里，像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演（1990）、在世界宗教议会上的讲演（1993）、在北京大学的讲演（1995）、哈佛大学的讲演（1998）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1999）等，也都阐发了这种说法。譬如，他于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里的提法为：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各文明之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和平；没有一种全球伦理，就不会有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参见汉斯·昆：《全球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载《基督教文化学刊》第4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这三句话，可谓“论证宗教对话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三段式”。就学理而言，最后一个判断显然是“基础性的”，即旨在表明：宗教研究乃是宗教对话的前提，或换种说法，只有对世界上的诸多宗教现象有所了解并有所反思，宗教对话才是可言的。前面提到，这个判断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由希克明确提出来了。而前两句话所表述的两个判断，即宗教对话之于宗教和平，进而宗教和平之于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和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则主要是汉斯·昆多年来集思广益、提炼升华之所获。

按照上列三段式的推断，宗教对话显然太重要了，不但事关宗教之间的和平相处，而且关乎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之间有无和平可言。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如果说那时此话一出，恐怕还有很多人特别是非宗教界人士怀疑，这是否把宗教研究和宗教对话的重要性“无限上纲”了，那么，不过20年，随着冷战后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日渐突出，民族性、国家间和文明间等形式的矛盾与冲突的不断发生甚至愈演愈烈，这种关于宗教对话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看法，则已然成为全球政要、宗教领袖，尤其是宗教学专家的共识了。由此可见，本攻关项目的两部分密切关联的内容——“宗教冲突研究”与“宗教对话研究”确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正是基于上述研究立意，课题组经过近五年时间的艰辛努力，完成了这部《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这部专著由三编构成，分为二十二章，其探讨思路和研究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编“当代宗教冲突研究”，不但致力于较为全面地考察分析当代宗教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且更注重探究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所包含的宗教因素，即宗教因素对于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的影响。在本编的研究中，我们努力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主要是指，虽然本编8位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不同，像宗教学理论、宗教哲学、基督教、伊斯兰教、中东地区研究、印巴地区研究、宗教现状与政策研究等，但大家都互为参照宗教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启发，

并通过集体讨论、相互学习等途径，针对不同的专题或问题，尽力把“现状考察”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可以说，像这样集中不同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学者来较为全面而深入地探讨本编的复杂内容，在国内理论界尚属首次尝试，在国际学术界也尚未见到类似的成果。

通过第一编前七章的具体考察分析，我们从“表现形式”和“冲突原因”双重意义上强调指出了“当代宗教冲突的错综复杂性”，并力图就此种复杂性加以理论深思，其“问题意识”和“探索思路”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广为参考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以论证宗教因素对于冷战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的影响；其次，通过评析国际政治学界关于“冲突原因”的主要解释倾向，以察觉现有研究的不足或欠缺；再其次，经过梳理宗教学的基础理论成果，以寻求探讨前述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启发；最后，着重阐释了宗教因素及其影响的四个复杂特征，即“积淀性”、“弥漫性”、“渗透性”和“深层性”，以提出一种有新意的宗教学方法论观念，使我们能更全面也更深入地认识宗教因素对于冷战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的影响。这部分理论探索工作详见作为本编总结的第八章“宗教冲突的理论深思”，是否合理妥当尚待专家和读者给予评价。

第二编“当代宗教对话研究”，主要包括三部分工作：（1）力求较为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宗教对话的形成背景与理论难题，此为第九章的内容；（2）大致梳理了世界范围的宗教对话现状，这是第十章的内容；（3）基于前两部分研究工作，力求全面而深入地探讨国际宗教学界现行的五种主要的宗教对话观念，即宗教排他论、宗教兼并论、宗教多元论、宗教兼容论和宗教实践论，以通过批判它们各自在宗教哲学方法论上的得失利弊，从总体上来反思宗教对话的特性与矛盾、难题与张力、历程与目标，以及观念与出路等。最后一部分工作构成了本编的主干内容，即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和本编结语。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新的进展主要有这样几方面：（1）根据新近材料，加强了对宗教排他论的分析评论；（2）经过理论比较，概括出了一种新的对话观念——宗教实践论，这种理论概括尚未见于国内外专业文献；（3）更为全面地把现有的宗教对话观念划分为五种类型，这在国际宗教学界尚属首次尝试。正是通过如上研究工作，我们把研讨话题引向

了下一编的内容。

第三编“中国宗教的和谐传统与现代价值”，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1）着眼中国文化传统，力求较为全面地回顾考察本土的和外来的宗教传统与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相冲突、相融合的历史过程，着重阐释诸宗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和谐特征，这部分内容见于第十六章至第二十章；（2）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力求较为准确地勾勒当今中国宗教现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政策法规方面的经验教训，此为第二十一章；（3）关注国际学术对话，力求为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提供“中国宗教文化经验”，这是本编最后一章的内容，也是全书的归宿。鉴于宗教对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际学术界近十几年来越来越注重回溯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以发掘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经再三考虑，我们选择的学术思路是，重点总结并评论我国老一代著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关于中国宗教文化历史特点的重新认识；关于中国宗教文化优良传统的概括总结；中国文化传统可为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提供的思想资源。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用前辈学者的成果来印证本编前些章节的基本论点，而是为了通过总结他们倾其毕生心血而获得的学术成果来“接着他们说”。就此而言，本项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这部分研究工作只是刚刚起步，我们仍将继续努力。愿望同行学者和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张志刚

摘 要

这部专著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04JZD005）的最终成果。全书由三编构成，分为二十二章，其探讨思路和研究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编“当代宗教冲突研究”，努力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但致力于较为全面地考察分析当代宗教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且更注重探究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所包含的宗教因素，即宗教因素对于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的影响。通过本编前七章的具体考察分析，我们从“表现形式”和“冲突原因”双重意义上强调指出了“当代宗教冲突的错综复杂性”，并力图就此种复杂性加以理论深思，其“问题意识”和“探索思路”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广为参考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以论证宗教因素对于冷战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的影响；其次，通过评析国际政治学界关于“冲突原因”的主要解释倾向，以察觉现有研究的不足或欠缺；再其次，经过梳理宗教学的基础理论成果，以寻求探讨前述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启发；最后，着重阐释了宗教因素及其影响的四个复杂特征，即“积淀性”、“弥漫性”、“渗透性”和“深层性”，以提出一种有新意的宗教学方法论观念，使我们能更全面也更深入地认识宗教因素对于冷战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的影响。这部分理论探索工作见于作为本编总结的第八章“宗教冲突的理论深思”。

第二编“当代宗教对话研究”，主要包括三部分工作：（1）力求较为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宗教对话的形成背景与理论难题，此为第九章的内容；（2）大致梳理了世界范围的宗教对话现状，这是第十章的内